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形塑文化主体性: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内生发展路径

张大维,邓 华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新内生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党政嵌入、村社自主与农民文化主体性构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对地方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是"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重构价值共识"和"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发展文化产业"交织融合演进的样态。其发展呈现为形塑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外部激活-内部转化-有机循环"螺旋上升路径:在党政力量通过激活村社自主性的基础上,村社组织依托党政嵌入要素,以制度性赋权和组织化赋能将自身集体行动能力转化为农民个体的文化发展动力和实践能力,从而构筑农民文化主体性,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持续性动能。

关键词: 文化振兴;文化主体性;党政嵌入;村社自主;新内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3;G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5)03-0120-12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内生发展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在乡村场域,文化振兴对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村庄共同体意识、培育乡村精神文明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文化振兴也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必然选择。

学界已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总体上呈现行政主导的外生发展、文化激活的内生发展、内外互动的新内生发展三条路径。行政主导的外生发展强调国家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2],通过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和"文化下乡"的方式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文化育民"[3]。这种自上而下的外生发展模式存在供给需求失衡、农民主体缺位等弊端。因此,强调激活乡村优秀传统文化[4],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内生发展路径兴起。这一观点认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振兴的资源基础,而农民是文化振兴的主体基础,要在农民的广泛参与中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新乡贤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5],能够凭借其在社会资本、组织协调、行为示范等方面的优势[6],引领民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构建多元主体集体行动机制[7],从而推进文化振兴。同时,可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等维度激发普通村民的参与动力[8],其参与程度受到社会关系网络、乡村资源禀赋、空间重构关系等要素影响[9],形成动员型、自治型、协同型和整合型等多

收稿日期: 2025-03-10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5.03.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ZZ011)

作者简介: 张大维(1981—),男,湖北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E-mail:zhangsir0619@sina.com

种乡村文化发展类型[10]。但实践表明，由于大多数村庄文化资源处于隐匿状态，且村民处于原子化、分散化状态，文化振兴难以仅仅依靠村庄内部资源和内生力量实现。由此，学者们提出内外互动的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路径，即整合内外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主体，党通过坚持先进思想文化引领、依托党组织网络整合资源、构建乡村文化治理体系为文化振兴注入动力[11]。村社自主是文化振兴的基础，政府通过融入乡村传统文化获取村民心理认同，扩展村民对主流文化的感知有用性，从而动员村庄内外主体围绕文化建设共同行动[12]。此外，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内外主体共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和技术动能[13]。

可见，新内生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但既有研究虽然强调了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需要内外力量协调互动，却并未揭示外部力量干预如何经由村社中介转化为乡村文化发展内在动力和实践能力的“激活－转化”递进机制，若外部力量输入并未激活村社自主行动，或村社自主行动异化为少数精英游戏而无农民实质参与，则乡村文化振兴难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本研究将探讨外部党政力量如何激活村社自主性，村社组织又如何将自主行动能力转化为农民个体的文化主体性，从而推动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

二、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

新内生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党政嵌入构成乡村文化振兴的外部触发条件，村社自主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集体行动载体，基于内外要素作用构建以农民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

（一）新内生发展理论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联结

新内生发展理论超越了传统“外生－内生”的发展二分法，强调外部资源力量与内生主体力量的转化互动，从而实现内生性发展。传统外生性发展理论认为，农村发展差异取决于以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外部资源[14]，强调引入资金、技术、信息等改善农村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实际是一种依赖和支配性的发展，在实践中呈现为政府主导的“技术－现代化”发展干预[15]，存在“民主赤字”“强外部依赖”“非均衡发展”“有增长无发展”“单一化发展”等问题[16]。在此背景下，内生性发展理论被提出，认为一个地区的特定资源（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源）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张强化地方能力建设，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发展。内生性发展因其难以实现而遭到批判——真正地依靠农村自身单一力量实现发展是罕见的，需要一种“内生和外生模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即注重根植于当地并向外看的农村发展方法，其关键在于上中层资源与地方层面的相互作用[17]。至此，乡村发展的理论总体上完成了从外生性发展论到新内生发展论的转变。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提出，乡村新内生发展是在资源、参与、认同三大核心基本要素基础上，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为出发点[18]，通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人情机制、面子观等方式动员村庄的资源、成员和观念[19]，最终实现“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的有机结合[20]。

新内生发展理论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价值冲击，乡村社会封闭而内敛的文化再生产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内生出外部力量嵌入的需求。而“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21]，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根植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文化振兴不仅要依靠外在力量推动，而且需要通过地方实践促进文化的在地化发展，乡村文化必然要从“行政主导”的外生干预转向“内外联动”的新内生

发展。

（二）“党政嵌入－村社自主－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框架

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就是在内外要素互动中激活乡村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参与行动、形塑乡村文化认同，而农民文化主体性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农民文化主体性，从外部条件与内部行动两个方面细化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进路，建构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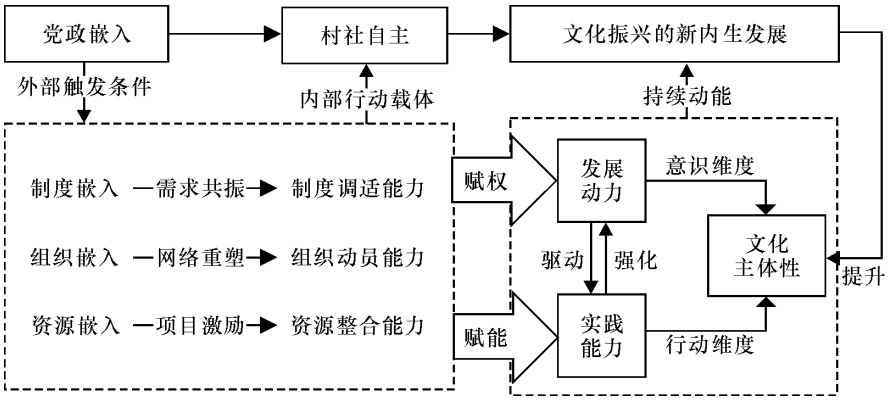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主体性驱动的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

党政嵌入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外部触发条件，党政力量通过制度、组织和资源供给激活村社组织的自主行动能力，使其从悬浮型组织转变为具备制度调适、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的行动主体。党政嵌入是嵌入理论在具体场景中的运用，指党和政府将制度、组织、资源等输入乡村社会，以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调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文化实践活动，重塑村庄公共价值规范，从而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22]。制度嵌入，指党和政府针对乡村文化建设做出决策，并将决策制定的规则嵌入到村庄文化建设之中，以此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公共规范重塑[23]。组织嵌入，指通过党组织网络纵向下沉与横向延伸，将分散化的村社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资源嵌入，指党和政府将各类文化服务资源输入村庄，以保障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党政力量并未直接与个体化的农民接触，而是首先与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社组织互动。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村社组织构成外部党政力量与农民的中介组织，村社自主性成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中间变量，即村社组织在维持内部秩序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偏好和需求，调动和整合内外资源以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促进集体行动，形塑公共价值规范的能力，表现为制度调适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村社组织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内部行动载体，通过向农民赋权增能，将集体层面的行动能力转化为农民个体的文化发展动力和实践能力，形塑农民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在文化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造自我文化意识、区分他者文化的特征与能力[24]，具体到乡村文化振兴场域则表现为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包括意识层面上农民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行动层面上农民继承与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行动和主动实践[25]。其中，意识层面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农民拥有的文化权利，行动层面则是对农民传承、适应和创新乡村文化的能力提出要求。但实践中农民很难与知识分子、政府、企业等平等地分享话语权[26]，且其自身能力不足。外部干预力量需经由村社组织的转化才能作用于农民个体，村社组织基于自身能力落实农民文化权利、赋能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培育农民文化主体性的重要

内容。文化发展动力与实践能力的联动互促构筑农民文化主体性。

“激活－转化”的递进发展重塑并强化农民文化主体性，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持续性动力，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也反过来巩固提升农民文化主体性。从过程来看，只有农民文化主体性重塑并始终在场才能实现内外要素协同，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从目标来看，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文化主体的发展，农民文化主体性构成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

三、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实践样态与比较

为更好考察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实践样态，研究团队于 2022 年、2023 年多次前往湖北省宜都市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资料查阅等多种方法途径收集资料，最终选取两个案例进行分析，缘由如下。一是理论契合性。两个案例有助于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的理论验证。宜都市历来重视乡风文明建设，近年来还创新性推进了各类基层治理实验，将大量资源投入文化振兴，具有鲜明的“党政嵌入”特点。两个案例村庄在 2018 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后从“落后村”逐渐转变为“示范村”，内含了“村社自主”特征。二是案例可比性。两个村庄文化资源相对丰富，W 村以稻虾共作的生态美景闻名，Y 村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三线”遗址，但实践中两个村庄呈现不同的文化振兴样态。三是普遍代表性。两个村庄分别代表了当前村庄文化振兴两个方面，即对文化的治理和以文化的治理[27]，前者将文化视为目的，意图形塑村庄公共价值规范，达成价值共识，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后者将文化视为工具，偏好借助文化建设争取上级政府支持或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村庄经济发展。

（一）W 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与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

W 村位于宜都市城区东郊，处于经济开发的热点区域内，面积 3.5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2162 亩，辖 6 个村民小组，共有居民 1445 户 3537 人，党员 130 人。W 村依托稻虾产业和门面出租，总体经济状况较好，但村庄内部村民收入分化明显，“人情风”严重，不仅给村民造成经济负担，而且形成物质攀比、自私自利的风气，侵蚀了真诚守信、友好互助的道德底线。

2018 年，宜都市应上级要求强化“人情风”整治工作，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明确红白事办理标准，并辅以严格的摸排、问责、惩戒制度以规范红白事办理。时逢 W 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走访入户中也深感人情压力给村民生活带来的负担过重。上级制度要求和自身治理需求的一致性促使 W 村以极高的主动性开展“人情风”整治。因此，W 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了《W 村红白事办理暂行规定》，重建了人情交往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边界，获得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

2019 年，宜都市入选湖北省“双基强化、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试点县市。在此背景下，各部门纷纷行动。例如：组织部要求建立“支部微家”网格支部；宣传部要求各村做实爱心超市和志愿者积分兑换制度；民政局要求各村修订村规民约，规范红白事办理。面对多项制度机制建设要求，W 村紧扣自身“人情风”整治需求，以新制定的《W 村村规民约》和《W 村红白事办理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为基础，统合基层党组织、爱心超市、志愿者服务积分、红白理事会、村庄法律顾问等制度、组织力量，建立“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即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积分档案作为奖惩依据以规范村民行为。为推动落实“家庭文明诚信档案”，一是村“两委”借助“支部微家”和红白理事会，带动全村 1445 户全部签订家庭诚信承诺书；二是党员牵头、积分激励，成立了宣讲小分队、文艺小分队、新风小分队等各类微组织进行规范宣传、落实；三是定期举办稻虾文化节，文化节中以集体祝寿、“学子茶话会”等集体活动环节替代部分私人办酒，强化人情活动的文化仪式属性。同时，为文明诚信家庭、“好婆婆”“好媳妇”颁奖，激活“孝老敬亲”“互帮互惠”的舆论氛围，倡导文明家风。

“家庭文明诚信档案”作为党建和文化品牌,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注,将W村列为各类基层治理实验创新试点村,由此带来更多项目资源。在资源激励下,W村加强档案馆、文化广场等阵地建设,积极探索以稻虾文化节为主要内容的农文旅产业。

(二)Y村的文化产业发展与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

Y村处于宜都市西南方向,属丘陵地区,面积9.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842亩,柑橘及茶叶种植2194亩,山林面积7166亩,辖6个村民小组,居民676户2167人,党员69人。Y村榨油历史悠久且土榨作坊多,还有二八八厂军工厂旧址、柴火豆腐坊等文化资源,但经济落后,村集体资产呈负债状态。Y村因文化资源丰富而经济贫困引起宜都市委、市政府注意,由市委书记挂点帮扶,有意将其打造为农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示范村。

2018年,上级党委和政府帮助Y村从外引进企业家党员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并且倾斜政策资金等资源,Y村也借此开启了农文旅产业发展道路。Y村村“两委”以联合党建为契机组织党员等前往旅游名镇学习考察,回村后与镇党委和镇政府、规划设计公司、村民代表、新乡贤等进行多轮交流,并通过湾组会等收集村民意见,形成了村级农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镇党委和政府多次牵线搭桥,帮助村庄引进市场企业。Y村则借助项目资源,以“村委会+合作社+公司”的模式整合村庄闲置资产、市场企业、党员、新乡贤、村民等资源力量建设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大环线。例如,整合多类项目资金盘活二八八厂闲置厂房,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吸引新乡贤返乡创业,建成劳动研学实践基地;积极争取200万元项目资金,与安易信农业开发公司共同建成沉浸式土榨坊;争取项目资金60万元,兴建清水桥河豆腐坊和农事体验区,引进桥河食品公司合股经营;支持村内能人筹建150平方米的算盘博物馆;成立女子威风锣鼓队、书画社等社会组织,为村民和游客提供舞蹈表演、手工彩画展等文化服务。

通过上述举措,Y村构建了丰富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既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企业团队建设等集体活动提供定制服务,又有效吸引散客群体自主前往,实现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30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40余个,并带动当地柑橘、茶叶、蔬菜等农产品销售。村庄经济发展直接强化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凝聚起勤劳致富、互帮互助的价值共识。

后Y村被列为省级“共同缔造”基层治理创新实验试点村,村民自发让地投劳,美化自家庭院,并建立了“公共设施群众管”机制,自主管理公共设施、文化广场、绿化带的环境卫生。

(三)重构价值共识与发展文化产业的新内生发展比较

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村庄需求不同,对待文化振兴的态度和目的有所差异,从而影响文化振兴的新内生发展路径。以目的为属性和以工具为属性的乡村文化振兴分别呈现“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重构价值共识”和“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发展文化产业”两种样态(见表1)。

目的属性的文化振兴以重构价值共识为核心目标,其实现依托农民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即赋予农民定义村庄公共价值的权利和文化适应与发展的能力,推动村庄价值共识的重构与内化。W村经济发展分化使传统“人情风”异化为面子竞争工具,不仅造成村民巨大经济负担,其内含的“邻里互助”“礼尚往来”“推己及人”等正向道德价值也被消解。当外部嵌入制度与村庄内在需求相契合时,触发村庄立足自身文化秩序需求重建“人情”的文化意义,并将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规范约束机制,成立社会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创作文艺作品以激活集体情感促进规范运行。这一过程由村“两委”引导村民广泛参与形成,通过规则共定、组织培育、情感动员等方式让村民逐渐掌握公共价值定义权和文化适应力,村民在参与中重构、内化“人情”的文化意涵。

工具属性的文化振兴重视文化连带的经济效益,其实现依托农民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即

赋予农民分配、使用文化资源的权利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能力,推动村庄文化产业发展。与 W 村不同,Y 村经济落后,人口外流严重,村民间社会联结弱化,处于离散化稳态共处状态,但村庄文化资源丰富,因此上级党委和政府试图通过资源倾斜发展 Y 村农文旅产业,以树立典型,彰显政绩。外部资源的强力注入激发村庄发展动力,村庄充分借助上级资源整合村庄文化资源以发展乡村农文旅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村"两委"与村民共同进行规划设计,支持新乡贤返乡创业、共建博物馆和文艺组织,极大保障村民分配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权利,激发其挖掘村庄传统农耕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

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的目的属性和工具属性总是交融发展,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由此在多样形态中不断演进。W 村因文化建设出色而得到上级关注,从而在项目资金争取中占据优势,开始探索实现文化资源的经济效应,逐渐走向文化产业发展道路。而 Y 村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乡村文化的市场迎合性改造,对村民文化生活需求关注不足的问题,要求重视文化对村民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满足。

表 1　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多案例比较

比较维度	W 村:乡风文明建设	Y 村:文化产业发展
村庄禀赋		
经济状况	发展分化	总体落后
社会关系	竞争性人情互动	离散化稳态共处
文化资源	相对丰富	丰富
党政嵌入		
输入要素	制度为主,组织和资源为辅	资源为主,组织和制度为辅
村社自主		
能力要素	制度调适与组织动员能力	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
文化主体性		
发展动力	定义村庄公共价值的权利	分配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权利
实践能力	文化适应与发展的能力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能力
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	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 - 重构价值共识	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 - 发展文化产业

四、形塑文化主体性的乡村文化振兴新路径

从长时间线来看,乡村文化振兴新内生发展是"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 - 重构价值共识"和"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 - 发展文化产业"交织推进的过程,其内在逻辑是外部党政力量激活村社自主性,村社组织在集体行动中将这种自主性转化为农民文化主体性,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激活 - 转化 - 循环"过程。

(一)"党政嵌入 - 村社自主"的外部激活

党政力量嵌入乡村文化建设既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也源于乡村文化内生性功能的衰退。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社组织是党政嵌入乡村的重要依靠力量,党政力量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激活村社自主性,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

1. 以需求共振激活村社组织的制度调适能力

基层党委和政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这种价值引领通常以系列制度规则和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其中制度嵌入的效果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契合程度[23]。当供给制度与地方需求较好契合时,村社组织会以极大主动性,依据村庄条件和需求,以农民认可

的方式整合、调适外来制度,以促进外来规范融入日常生活情景中,形成潜移默化的规训和认同的力量。这种立足自身需求和资源禀赋,整合、调适制度机制以实现上级意志与乡土需求相统一的能力便是制度调适能力。例如在W村,上级整治"人情风"的要求为村级组织遏制人情异化提供了充分理由和权威力量,W村基于家户传统,将上级制度组织建设要求整合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以重塑公共价值,规范村民行为;Y村被列为"共同缔造"基层治理创新实验试点村后,也依据自身农文旅产业发展需求,将上级要求的村民参与和景区环境卫生管理相结合。

2. 以网络重塑激活村社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

现代乡村社会中,权力的文化网络逐渐被权力的组织网络所替代,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关系。但随着税费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数字技术等不断发展,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联结日益弱化[28],村"两委"越来越难以动员统筹村民开展集体行动,促进主流文化传播和价值共识形成。对此,一方面,上级党委和政府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案例村庄的村党支部书记均是由基层党委和政府引入的企业家担任,他们年轻且富有见识,思维开阔,敢想敢干,能够带领村庄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党组织的群众性特质克服村"两委"组织悬浮问题,一是纵向组织延伸,建立了"村党支部-网格/湾组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党组织网络,并设立相应活动制度,便于日常文化宣讲与村民议事协商;二是横向组织吸纳,以基层党组织为依托,吸纳有威望、有才能的村民组建各类自组织;三是党员模范带动,引导村民遵守公共规范,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由此构建起以党组织领导为核心,纵向贯通、横向整合、广泛联结的立体化乡村文化网络,为村庄组织动员村民参与村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组织支持。

3. 以项目激励激活村社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

乡村文化振兴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空间打造等物态层面内容,需要资金支持。相较于常态化资源输入,项目制资源更能够提升村社组织开展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其一,项目制资源采取竞争性分配,政府往往偏好把资源投入到容易"出成绩、出亮点"的村庄,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村庄若想获得更多的资源,需要积极整合资源进行建设,塑造高效可信赖的村"两委"班子形象,以良好的"政绩"作为向上博弈的资本。W村能够获得上级资源支持源于村庄在前期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或制度创新展现了较强的执行力、组织力。其二,项目制资金采取分期拨付、先建后补,要求村庄向上申报后自主筹措资金和劳力进行建设。村庄在获取项目资金后,需要强化资源整合能力,动员村民共同参与文化建设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例如,Y村在获取各类项目支持后,整合政府各类项目资源、市场资金和村庄人财物资源,以修复农耕文化建筑、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村社自主性-文化主体性"的内部转化

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是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动力所在,内涵意识与行动、权利与能力等多维面向。村社组织作为联结党政力量与个体农民的中介,通过何种方式将自身集体行动能力转化为农民个体的文化主体性,构成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关键环节。

1. 以制度性赋权强化农民文化发展动力

个体的能动性生成于对资源、规则和话语权的掌控,农民只有拥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权利,才会产生对"我的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赋权是主体对权力的感知,村社组织能够凭借党政嵌入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网络,通过协商议事、利益联结等机制落实农民的文化决策权、资源控制权、文化表达权,从而提升农民公共性和效能感,强化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

一方面,村社组织依托协商议事机制落实村民参与、管理和监督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的权利,让村民在共商共议中实现从"他者定义"转向"自我建构",达成公共性再生产与乡土价值体系的本体

认同。长久以来,由于行政任务重及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村社组织形成“向上回应”和“替民做主”的偏好[29],农民文化主体地位被部分遮蔽,产生“乡村文化振兴与我无关”等消极心理。案例村庄中,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在党政嵌入的组织网络支持下积极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基层党组织制度,借助村民代表会议、湾组会等协商议事平台收集村民意见,将村庄文化建设决策权交由村民。例如,W 村以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事规范,以“支部微家”定期组织村民议事;Y 村的农文旅发展规划经历了“党员外出学习—村级初步规划—湾组会收集意见—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决策流程,村民意见被广泛采纳。村民在协商议事中积极表达、相互沟通,不仅激发和形成公共意识,而且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根本性身份确认,形成“乡村文化的主人”的认知。

另一方面,村社组织以利益联结机制强化村民对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控制权和受益权,让乡村文化建设与村民个体利益紧密相连,村民在具象化的利益感知中提升参与文化建设积极性。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0]。当乡村文化建设与村民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时,人们就会主动参与和支持,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也随之形成[31]。在 W 村,形成何种价值规范并不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关,但人情攀比的恶劣演化必然会影响村庄整体发展,因此 W 村以“家庭文明诚信档案”为中介,将村民行为通过积分形式与村集体福利待遇和股份分红相挂钩,W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过百万,此举有力带动村民自我约束。在 Y 村,农文旅产业以“村委会 + 合作社 + 公司”的模式整体运营,村民通过分红、就业等形式直接获益,因此都支持村庄文化产业建设。可见,落实村庄集体经济制度,发展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强化村民与村庄的利益联结是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2. 以组织化赋能提升农民文化实践能力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基础[32],文化主体需要通过自觉行动来实践主体性,这本质是对村民文化实践能力提出要求。原子化的村民因资源分散、能力薄弱而难以独自承接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使命,村社组织由此凭借党政嵌入的制度、组织和资源等要素将农民组织起来,依托多样化组织载体,通过集体话语表达、资源聚合利用、日常交流学习等机制系统性提升农民文化适应能力、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

以组织化建设拓宽集体话语表达空间,助力村民文化适应能力提升。文化适应能力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传统底色并主动适应现代化的能力,既包括找寻本土文化中有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资源,构建更具主体性的乡村文化现代化道路,又指在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自主适应现代化发展规律,赋予文化以新时代内涵[33]。村社组织在村庄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等既有组织形式外,成立网格/湾组党支部、红白理事会、文艺小分队等组织,使原子化村民获得更为宽阔的制度化、组织化权利表达渠道,村民积极表达需求,并灵活地援引国家政策和价值话语赋予乡村文化以合法性,争取政府政策和资源支持,由此推动主流文化与乡村文化互构发展。如 W 村红白理事会建议在稻虾文化节中嵌入“六礼祝寿”环节,阐释新时代“二十四孝”以推动乡风文明建设;Y 村女子威风锣鼓队、书画社的歌曲表演、手工彩画等将乡村生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组织化建设搭建资源聚合利用平台,强化村民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对乡村文化进行现代性重构要从资源层面向产品、产业层面转化[34],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就是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能力。农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能够以组织化形式对内聚合村庄力量、对外衔接政府资源和市场力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 Y 村豆腐坊建设为例,村民以柴火土豆腐制作工艺、资金、房屋等入股成立合作社,向上申请项目资金 60 万元兴建豆腐坊,并引进公司合股经营,村集体每年按 50% 保底分红。合作社与公司共同设计品牌标志,不仅生产

传统柴火豆腐，而且纳入村庄文旅大环线提供豆腐制作体验活动，实现将乡村沉睡的农耕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此外，合作社发挥文化产业独特的辐射带动优势，鼓励村民种植黄豆，带动3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

以组织化建设激活日常交流学习生态，促进村民文化创新能力跃迁。文化创新能力指向补充、拓展、完善乡村文化内涵，发展其现代化表达形式的能力。乡村文化根植于村民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多样化、碎片化形式显性或隐性地存在于村民日常生活中[35]，因此，只有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调动其文化创新活力。案例中，村社组织通过党员和新乡贤带动组建舞蹈队、锣鼓队、书画社等各种文艺组织，这些文艺组织在展演竞赛、技能培训、自主交流中用自己的力量传承与创新乡村文化。比如，W村文艺小分队和Y村女子威风锣鼓队不仅平时组织村民跳广场舞，聚在一起学习网络上流行的舞蹈样式，结合自己的想法创作出大家都喜欢的节目，而且经常参与村里、镇里和市里的文艺表演活动和广场舞比赛，在相互交流中提升文化创新表达能力。

3.“动力－能力”联动互促构筑文化主体性

强化文化发展动力与提升文化实践能力分别映射文化主体的意识与行动，是一体两面之事。村民如何评估自身能力、如何认识乡村文化、如何看待乡村文化振兴，直接影响其主体行动选择，而这种主体意识又生成于文化实践。

文化隐匿于村民日常生活中，村民用之而不觉，更不知何谓乡村文化振兴。通过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完善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村庄公共规范、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等文化实践，乡村文化以显性形式展现出来并不断传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村民认识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农耕文化等对乡村秩序重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树立起乡村文化自信。同时，村民因参与建言献策、文艺创作、投工投劳等，自身的存在感、意义感、价值感得到极大满足，乡村文化自觉逐渐生成——自己是乡村文化的定义者和责任者，应以更大的热情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三）“文化主体性－新内生发展”的有机循环

“激活－转化”的递进机制让党政嵌入力量在村社组织的自主行动中转化为农民文化主体性，实现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文化新内生发展也反过来巩固提升农民文化主体性。

一方面，农民文化主体性在场推动内外要素协同，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36]党政嵌入乡村完成文化整合、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是浸润在乡村社会中的生活主体，要让村民在日常生活情景中完成精神世界的现代性重塑。只有村民在场，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实现党政嵌入的制度、组织和资源等要素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从而活化村庄内部文化资源、重塑文化认同。结合案例发现，无论是公共规范制定、文化活动供给，还是文化设施建设、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村社组织无一例外地征求村民意见，动员村民出资投劳，引导村民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正是在村社组织的引导和村民的参与中，党政嵌入要素与村民文化需求有机融合，乡村文化成为美好生活愿景的表达。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引领带动更多人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村民在文化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文化主体性。生活决定意识，村民的文化需求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带来的良好村庄秩序、文化产业发展让村民意识到“文化是个有用的东西”，愈来愈多的人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积极投身于文化活动、文艺创作、文化产业等，从不理解到观望、到尝试再到乐在其中，村民加强自身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农民文化主体性构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分析框架，对乡风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发现：

第一，村庄发展需求差异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形塑两种类型的农民文化主体性，并导向不同的乡村文化振兴新内生发展样态。在文化秩序需求较高的村庄，党政力量以制度嵌入为关键，激活村社规则再造，农民在村社组织引导下获取定义村庄公共价值的权利和文化适应与发展的能力，生成秩序导向型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振兴从政策驱动转向秩序内生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需求较高的村庄，党政力量以资源嵌入为关键，促进村社组织整合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农民在广泛参与中落实分配、使用文化资源的权利，并提升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能力，生成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振兴从资源输入转向产业内生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村庄，两种文化主体性及乡村文化振兴新内生发展样态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得益彰。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实践样态根植于文化的目的属性与工具属性的辩证统一，文化目的属性与工具属性的动态耦合驱动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路径叠加转化。文化的目的属性通过工具化实践得以实现，村庄在培育农民秩序导向性文化主体性、重构价值共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村庄文化资源，将文化品牌化等，这就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的工具属性服务于文化的目的属性，村庄培育农民产业驱动型文化主体性、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也是推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而面对其中可能出现的文化表征异化风险、经济利益纠纷，也倒逼村庄再造公共规范，重构价值共识。

第三，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形成于以村社自主为中介的“外部激活－内部转化－有机循环”的路径过程，且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是这一路径的核心。首先，外部党政力量通过需求共振、网络重塑、项目激励机制，以制度、组织和资源等外部资源要素激活村社组织的自主行动，提升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制度调适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其次，村社组织依托党政嵌入要素，以制度性赋权和组织化赋能将自身集体行动能力转化为农民个体层面的文化发展动力和实践能力，形塑农民文化主体性。最后，农民文化主体性以其在场优势推动内外要素协同，促进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同时，文化新内生发展也反过来巩固提升农民文化主体性。

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激活－转化－循环”机制不仅拓展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运用边界，而且揭示了文化资源丰富的村庄进行文化振兴的密钥，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新的启示。第一，党政嵌入乡村文化振兴要注重激活村社自主性。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党建引领下的政府力量介入，但政府嵌入不足会引致主流价值难以传递、嵌入过度会抑制乡村文化多样性和村民参与积极性，因此要在深化党建引领、强化党组织“统合型经纪”作用的同时[37]，因地制宜调适政府力量嵌入的方式和力度，其关键考量就在于是否能够激活村社自主性。第二，村社组织是承接党政力量、组织村民参与的中介组织，乡村文化振兴要持续性强化村社自主性建设。以制度、组织、资源等要素激活村社自主性，提升村社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制度调适、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第三，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乡村文化振兴要强化农民文化主体性。村社组织要积极组织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不仅以协商议事、利益联结等制度性赋权机制落实农民的文化决策权、资源控制权、文化表达权，而且借助服务互助类、经济合作类、文化娱乐类等多样化组织载体系统性提升农民文化适应能力、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2]陈建. 超越结构性失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J]. 图书馆建设,2017(9):37-43.
[3]罗哲,唐迩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29-135.
[4]沈费伟. 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J]. 人文杂志,2020(4):121-128.
[5]李少惠,赵军义. 乡村文化治理: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 图书馆建设,2021(4):20-28.
[6]刘玉堂,李少多. 论新乡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功能——基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J]. 理论月刊,2019(4):125-131.
[7]丁洁莹.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在场的逻辑进路[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91-101.
[8]温丙存.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J]. 探索,2023(3):137-148.
[9]袁金辉,梁一梦.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23(9):196-205.
[10]李建军,段忠贤.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2023(1):170-176.
[11]黄嫣,蔡振华.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05-110.
[12]张新文,张龙. 乡土文化认同、共同体行动与乡村文化振兴——基于鄂西北武村修复宗族文化事件的个案启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9-28.
[13]吴玲,陈艳.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要义、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J]. 当代农村财经,2024(3):28-32.
[14]HUBBARD C, GORTON M. Placing agriculture within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EU case studi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11(1):80-95.
[15]卢飞. 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18-128.
[16]LOWE P, RAY C, WARD N, et 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R].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1998:9-10.
[17]RAY C.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2001:3-9.
[18]张文明,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2018(11):75-85.
[19]马荟,庞欣,奚云霄,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20(3):28-41.
[20]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等. 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2(5):36-54.
[21]费孝通. 乡土中国[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18.
[22]邓华. 嵌入式整合:乡村传统文化新内源性发展的助推机制——以华中J村"四福"文化建设为例[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61-71.
[23]陈勇军,郭彩琴.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J]. 学术探索,2023(2):111-118.
[24]李建军,张玉亮,王爱红.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特点及进路[J]. 广西民族研究,2024(1):139-148.
[25]戴圣鹏. 如何把握文化主体性?——以"文化主体"概念为原点的思考[J]. 理论月刊,2024(12):13-20.
[26]沙垚,王昊. "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11-117.
[27]吴理财,解胜利.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
[28]卢青青. 行政激活自治: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实践[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24-31.
[29]梁丽芝,赵智能.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样态、缘起与突破[J]. 中国行政管理,2022(6):151-153.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31]杨希双,罗建文.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61 - 274.
[32]亓光,张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概念的原理性溯源——基于概念演变的视角[J]. 社会科学研究,2024(6):1 - 10.
[33]黄燕华. 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 社会科学辑刊,2024(1):113 - 118.
[34]李佳. 从资源到产业: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J]. 学术论坛,2012(1):77 - 81.
[35]王成利,鲁冰,程静静. 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建构路径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22(10):85 - 91.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9.
[37]原超,马华.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31 - 140.

Reshap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Da-wei, DENG Hua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constitute the key to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eo-endogenous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grounded in farmers' cultural subjectivity,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focusing on local practice. The investigation elucidates the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intrins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neo-endogen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manifests through two distinct modalities: order-oriented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at institutionalizes communal norms, and industry-driv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at catalyzes cultural industries, with both modalities achieving synergistic convergence through dynamic interaction.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constitutes a spiral progression of "external activation-internal transformation-organic circulation", whereby Party-government embeddedness activates village autonomy through demand resonance, network restructuring, and project-based incentives, while highly autonomous village organizations leverage embedded institutional elements to operationalize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building, thereby converting collective action capabilities into farmers'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party-government embeddedness; village autonomy;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王娟】